



国际名人看中国

China in the Eyes of
International Celebrities

Travel to the Northwest in 1970s

七十年代西行漫记

[美] 海伦·斯诺 著 安危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611

国际名人看中国

China in the Eyes of
International Celebrities

七十年代西行漫记

[美] 海伦·斯诺 著 安危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5-5174

© 2018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Beijing Publishing Group Co., Ltd 2018

未经书面许可，不得翻印或以任何形式和方法使用本书中的任何内容。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七十年代西行漫记 / (美) 海伦·斯诺著；安危译。—
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6

(国际名人看中国)

ISBN 978-7-200-13720-0

I. ①七… II. ①海… ②安… III. ①访问记—美国—
—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324087号

国际名人看中国 七十年代西行漫记

QISHI NIANDAI XIXING MANJI

[美] 海伦·斯诺 著 安危 译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印刷

*

880毫米×1168毫米 16开本 9.5印张 113千字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0-13720-0

定价：3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010-58572393

总 序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北京出版集团出版“国际名人看中国”丛书，不仅是系统全面地介绍和纪念为建立新中国所做出巨大贡献的国际友人，也是秉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通过传承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广交国际朋友，让更多的外国人来讲述中国故事，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今天的中国发展，向世界说明真实的中国。

“国际名人看中国”丛书收录了多个国家的著名人士的作品。这些作者在20世纪亲历、见证了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他们通过在华参加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切身感受，深刻地诠释了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扎根中国大地、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独立自主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我们今天再次阅读这些国际友人传世的经典著作，会更加深刻地体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保持

艰苦奋斗的作风，坚持变革创新的精神，才能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国际名人看中国”丛书中，有很多国际友人，在今天仍然对中外人文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80年前，这些国际友人跨越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将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介绍给世界，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真相。向世界说明真实的中国，让世界把目光投向中国——80年前斯诺他们做到了，今天我们更有必要做到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和平发展，使更多友好的目光投向中国。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们，在不同的时期对中国的看法都不相同。今天的中国，应该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努力引导各方面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发展和国际作用。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甚至融入中国，我们无法回避。我们相信，只要秉持包容精神，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通过文明交流互鉴增进各国人民友谊、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维护世界和平，不同文明间就能够相互促进，共通共融。

2017年4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北京培黎职业学校的信中强调指出：“希望你们发扬传承艾老‘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积极开展国际文化交流，谱写国际友谊新篇章，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路易·艾黎和宋庆龄、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等人发起成立的工合国际，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他在华工作60年，为支援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人民和新西兰人民架起了友谊之桥。在人文交流中，这些有着共同记忆的人物一直是构建平台的主线，因为历史不会忘记那些为人类的和平与友谊做出贡献的人。当习近平总书记在英国女王于白金汉宫举办的国宴上讲话时特别提到：一位中文名字叫作何克的英国记者，积极投身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仅撰文揭露日本侵略者暴行，还担任陕西双

石铺培黎学校校长，为带领学生向安全地区转移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近年来，在何克就读的英国圣乔治中学和李约瑟就读的英国奥多中学，由英中了解协会和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论文比赛已经开展了三届，这些英国的中学生已经开始通过论文写作来了解今天的中国。在美国，来自斯诺家乡的肯尼迪教授将开始《红星照耀中国》出版 80 周年的全球巡展；中国问题专家麦金农教授筹备的以史沫特莱研究为主题的大型展览也将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举办。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在这个新的时代，中外关系正在出现新的特征，因而对人文交流的目标和内涵提出了新要求。人文交流的背后也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世界的了解和尊重，更是引领各国民众为了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发展“相向而行”。阅读这些国际友人们的作品，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什么是“国之交在民相亲”。衷心祝愿国际友人们的伟大精神历久弥新，让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古长青！

孙 华^①

2018 年 6 月于北京

^① 孙华，博士、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

译者前言

作者海伦·斯诺（1907—1997），笔名尼姆·韦尔斯，是《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1905—1972）先生的前妻，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她和斯诺先生20世纪30年代旅居中国，同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积极支持“一二·九”运动。继斯诺之后，于1937年赴延安采访，写了《续西行漫记》一书，对介绍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陕甘宁边区真相及我党政策，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长期的斗争生涯中，海伦·斯诺和中国人民建立了诚挚深厚的友谊。她支持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极为崇敬，认为中国革命是个奇异的神话，而她和斯诺是这个神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延安和保安（今陕西省志丹县）是她和斯诺的第二故乡，她常为自己能把一生最宝贵的时光贡献给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而感到自豪。近半个世纪以来，她致力研究中国的革命和历史，写了卷帙浩繁的报道集和论著，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72年至1973年，海伦·斯诺来华访问3个月，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分别致函，向她表示关怀和慰问；朱德委员长会见了

她；邓颖超、康克清同志宴请了她。

1978年秋，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海伦·斯诺率电视摄影小组来华拍摄电视片，历时6周。在北京，她和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见面；10月6日至10日，在西安拍摄了她和斯诺先生20世纪30年代活动过的地方、革命纪念地和名胜古迹，并采访了王震副总理；10月11日至14日，到延安、志丹进行采访。此外，还访问了我国其他几个城市。海伦·斯诺每到一地，都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故地重游，触景生情，往事历历在目，海伦·斯诺往往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用美好的语言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友情和祝愿。回国后，撰写了大量的访华观感。

海伦·斯诺访问西安期间，译者有幸接待了中国人民的这位老朋友，被她的深情厚谊深深感动。本书所收录的文章，是根据她提供的英文打字稿并经她特许翻译的。由于这些篇章，都抒写了作者20世纪30年代在西北的经历以及重游故地的感想，故取名为《七十年代西行漫记》。

《保安行》，系作者应邀为美中友好协会会刊《新中国》杂志写的一篇文章，包括了本书有关章节的内容，但又不尽相同，故收录于后。这篇文章的中文译稿，曾在《延河》文学月刊1979年10月号上发表，这次做了重译。

“一二·九”运动和西安事变的参与者、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负责人陈翰伯同志、吉林大学外语系张兆麟教授校正了译稿中的部分人名；采访过海伦·斯诺访华活动的《人民画报》社孙毅夫同志热情地提供了照片；北京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一并谨致诚挚的谢意。

安 危

历史的回顾

我和我的丈夫埃德加·斯诺常常感到，我们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的活动，成了中国西北形势的一部分，我们是那些和杨虎城将军一起发动了1936年西安事变的东北难民们的特殊朋友。为了寻求真理，我们心甘情愿，冒着一切风险，于1936年和1937年分别完成了我们的西北之行，并把事实真相公诸于世。

1932年12月25日，我们在美国驻日本东京大使馆结了婚。然后，去南洋进行了一次漫长的蜜月旅行。最后，于1933年3月到达北平（今北京，下同）。我们从日本出发，经过台湾、婆罗洲、苏拉威西、爪哇、巴里，取道新加坡，回到香港、广州。然后，乘汽轮沿中国海岸北上，一路上参观了条约规定的所有通商口岸^①。1931年，我携带1930年出版的斯彭格勒写的《西方的衰落》（全二卷），已经到过中国。使我惊讶的是，他的理论，正好赶上1929年至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萧条时期。……那时，英国统治着世界上一个很大的区域。荷兰统治了印度尼西亚；法国统治了印度支那和别的一些地方。埃德^②和我旅行期间，一直在研究没落的

① 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规定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五处为通商口岸，亦称“五口通商”。——译者注

② 埃德，埃德加·斯诺的昵称。——译者注

西方帝国将要发生的情况。我们明确无误地意识到日本取代西方、占领中国的企图。我们一到北平，就在煤渣胡同21号一座中国式的小房子住下，埃德便坐下来，写了一篇题为《西方声誉下跌》的长篇文章。他不知道该把这篇文章寄往何处，因为他通常给《纽约先驱论坛报》撰稿，每篇稿酬约150美金。我坚持不让他删改，给《星期六晚邮报》寄去。该刊当时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杂志，稿酬也最高。他断定人家不会考虑采用这篇文章，嘟囔了好半天，最后还是采纳了我的意见。

几周后，我们去拿家里寄来的邮件，发现了一个从《星期六晚邮报》寄来的小小的开窗信封^①。然而，我们以为是要求预订报纸，甚至没有立即拆阅。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张小纸片（支票），上面写的数字是“\$ 750.00”，我们以为是打字打错了，可能是“\$ 7.50”之误，充其量是“\$ 75.00”。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坐上我们私人的黄包车，去国立商业金融银行（当时美国在华的唯一银行）。“这张支票是真的吗？能不能存？”埃德无法相信自己的好运。银行出纳员毕恭毕敬地看了看埃德，说：“是真的，当然能存。”1元兑换成5元，我们靠这笔款子，过了一两年。

那篇文章是来自美国方面支持中国独立的最初例证之一，也是极力反对已于1931年侵占了满洲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例证之一。埃德的名字，从1931年起就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他无论到哪一个日本占领区去，总要成为日方的攻击目标。对美国一家最大的、最有影响的杂志来说，发表这样的观点，是形势变幻的一个重要标志。与

① 信封正面有透明纸框，可以看见信笺上收信人的地址。——译者注

此同时，埃德的第一本书《远东战线》，在纽约由史密斯和哈斯出版公司出版了。埃德是第一个报道日本占领满洲的外国记者，也是第一个报道1932年上海之战的外国记者。这些事件，都是我们亲临现场，耳闻目睹过的。

我俩都反对在中国领土及其他地域的外国帝国主义，我们想，是改弦易辙的时候了，美国应当反对日本接管中国的计划——原则上应该如此，当然不能去积极参战。那时，英国人犹豫不决，因为他们和日本人签有军事条约，中国一旦被日本占领，他们中的一些人企图瓜分中国。只有美国人能够采取公开的、积极的立场反对日本，埃德和我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我们决定支持美国人应当支持的事情。与此同时，埃德还是英国工党报纸《伦敦每日先驱报》驻远东记者。这家报纸，是费边式的社会主义工党的喉舌，是反法西斯的，然而却没有任何制止希特勒、墨索里尼以及日本的真正政策。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到了1934年，蒋介石及其一方，已在竭力仿效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我把它叫作“次法西斯主义”，因为它还不是真正的法西斯主义，而只是“卖国主义”。后来，欧洲人把它称作“吉斯林主义”^①。

1934年至1935年期间，埃德在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新闻系任教，我获准在所有的英文班听课，还包括一个讲授黑格尔的中文班，我是这个班里唯一的外国人（燕京大学当时只有6个外国

^① 吉斯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侵占挪威后拼凑的傀儡政权的头目。他于1933年5月组织了挪威的法西斯政党民族统一党。1940年4月，纳粹德国进攻挪威时，吉斯林协助希特勒匪徒占领了挪威。同年9月，德国法西斯占领军封他为挪威“国家元首”。吉斯林的卖国行径遭到挪威人民的强烈反对。1945年，挪威从纳粹德国占领下获得解放后，吉斯林由于是挪威主要战犯之一，血债累累，被判处死刑。从此，吉斯林的名字就成为“傀儡”和“卖国贼”的同义语。——译者注

人)。张东荪是我的老师，后来成了我们的朋友。1937年，他和我们一起使我们主办的《民主》杂志得以创刊。我以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思想工具，开始更透彻地了解中国。那时，华北死一般的寂静——土肥原贤二打算利用中国的傀儡，一枪不响地占领华北。这个阴谋很快得逞了。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北平当局，都竭力制止中国人公开反对。没有一家中国报纸敢于刊登事实真相。

我拼命地写作反法西斯的文章，反对在中国实行法西斯主义，反对复活儒家学说。然而，我的文章当时未能发表，其中一部分文章和我的学生运动资料以及许多照片，于1958年至1961年期间，存入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尼姆·韦尔斯文库”，因为我怕我住的这座小木屋着火。“麦卡锡时期”^①之后，从1950年至1970年、1972年间，任何一个进步作家，根本不可能通过美国有广泛影响的宣传工具，发表任何关于中国的东西。

凡是法西斯主义主张的，埃德和我都予以反对。1935年在北平，我以反法西斯的主要中坚人物而自居，整天思考反法西斯的问题，寻找反法西斯的材料。1935年秋，燕京大学学生运动的新任领导人，开始到北平城内盔甲厂13号来找我们。那时，我们已从海淀区搬到那儿居住了。

这些燕京大学的学生破釜沉舟，随时准备牺牲一切。第一个来找我们的是张兆麟，他是东北的难民，义愤填膺，爱国心切。他想了解东北义勇军的情况，因为埃德到那儿去了一趟，刚回来。我们谈到发动抗日无望时，他开始痛哭起来。我们喜欢张兆麟，我们深深地喜欢所有的青年学生。没多久，他们就发动了著名的1935年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采用法西斯手段迫害国内民主和进步力量的时期。——译者注

“一二·九”运动。由于这次运动，我们决定站在学生一边，尽一切所能，帮助那些支持正义、为数不多的中国青年。那时，只有不受约束的、年轻的美国人，才有可能成为活动分子——我们不是共产党员。然而，我们心里非常明白，中国需要一次彻底的革命，不可坐失良机。埃德在上海受了孙中山夫人的影响——我也赞同她所支持的事业。

7名燕京学生运动的领导人，是决定燕京大学采取行动的小组委员会的部分成员，他们希望最后得到其他学校的支持。由清华、燕京和几所女子中学牵头领导。陈翰伯是《燕京报》的编辑，他来找我们时，我给了他许多反法西斯的材料。1980年6月1日，他来美国麦迪逊市看望我，带来1979年一期《读书》杂志，上面刊有他写的一篇关于盔甲厂的一个下午的文章——然而，我却不知所云，因为我只学了200个中国字。

我从未想到，陈翰伯并不是东北难民，他是“一二·九”运动的3个主要发起人之一。多年来，我一直把他和张兆麟写成是从日本占领区逃出来的东北难民和爱国者。可是，他1980年告诉我，他是苏州人。陈翰伯以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的身份应邀访美。我也一度怀疑燕京大学另一位主要发起人黄华是东北难民。可是，我1971年在纽约见到他时，他告诉我，他是河北本地人。从1937年在延安见面后，那是我们分别后的第一次会面。1977年，他担任中国的外交部长。他和龚普生安排了我1972年至1973年重访中国的计划。龚普生是7个主要发起人之一。女生中另两位发起人是李敏和张淑义。1980年，龚普生被任命为中国驻爱尔兰大使。第七位发起人是个男生，名叫陈絮，他的祖父曾经当过宣统皇帝溥仪的家庭教师。参与发起这次运动的，还有其他一些学生。可是，据我所知，这7位最早下了决心，不惜一切，准备行动。

1935年11月1日，中国有史以来写得最好的文献之一——《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取自由宣言》终于问世了。这是中国历史时代的真正产物。它向南京政府宣战，反对镇压一切爱国自由，反对“非法缉捕学生”，通篇充满反法西斯的精神。它宣告，从1927年起，“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至30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被封闭之报刊，被缉捕之作家，不计其数。”南京政府对这一切，都要负责。这个文件，最初由“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清华大学以及其他8所学校联名签发，其中6所是中学，大约印了2000多份，寄往全国各个学校。

当埃德和我请人把这个文件译成英文时，我们感到很惊讶。我们对激烈有力的措辞并不是不喜欢，而是很想知道这个革命的宣言出自谁人之手。有人告诉我，是由黄华和其他一些人起草，高名凯修改、润色的。

由于这是一次反法西斯运动，埃德和我都拿定主意，不惜一切牺牲，尽我们最大的可能予以帮助。我们当时还仅20多岁，或许，埃德刚到30岁。“一二·九”运动从一个新的高度，第一次显示了美中人民之间真正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属于反法西斯左翼力量一边。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西方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的一种自然的外交联系。

我写了《1935—1936年中国学生运动》一书，1961年登记了版权。在大学图书馆里，这本书成了所有中国问题学者以及研究远东问题的学生的精读书。

1968年，在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主持的一次会议上，一个新的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在费城成立了。这个委员会主要是由费正清教授的两个学生组织的，一个是菲利普·韦斯特，一

个是詹姆斯·派克。我出席了成立大会，他们告诉我，他们阅读了我写的关于中国的全部著作，对“一二·九”运动了如指掌。这个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是对美国麦卡锡“白色恐怖”发起的最初的进攻之一，它冲破了这一丑恶卑鄙的法西斯镇压。

在中国，“一二·九”运动打破了国民党从1927年以来制造的白色恐怖，这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最进步、最勇敢的事件之一。当时，谁也断定不了会发生什么。学生们意识到自己面临着死亡和坐牢。他们的动机就是这么单纯！

1980年，陈翰伯带着纽约大学的蒂莫西·董来我家。蒂莫西对“一二·九”运动秘密的解释是千真万确的。他说：“我在中国上学时，陈翰伯以及那些北平学生是我们的英雄。‘一二·九’运动实在是‘纯洁无邪’！”

他这样一说，也为我解释了一些别的问题。中国人和西方人都不止一次地问过我：“你如何解释中国人对你丈夫以及对你的印象呢？”我没有真正地思考过。这是因为我们正如蒂莫西所说的那样，“实在是纯洁无邪”。条条选择向我俩敞开着，然而，我俩却不惜一切代价，选择了一条艰难而危险的道路。这一点，对从1925年以来度过了漫长岁月的孙中山夫人也同样适用。正因为如此，埃德和我都把她当作纯洁的象征予以敬重。按照西方的文化，我们把这一点叫作“崇高的精神品质”，意思是高于那种使人意气消沉的“实利主义”的水准，比一般人希望成为的、或希望做到的更进一步，而且也为“例行公事”所不及。这意味着以人类的利益为重，或以某种良好的愿望为出发点，摆脱个人和家庭那种烦琐自私的利害关系去检点自己的行为。我们作为在华的外国人，能办一些中国人当时办不到的事情。我们尽量利用这个有利的条件。

中国的纯洁时期，是1936年的保安时期，当时，埃德加·斯诺也成了它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把中国革命中这一不朽的纯洁时期——1935年秋，长征刚刚结束之后的时期——永载青史。他以出自内心的热忱，紧紧扣住了这样一次不可多得的、崇高的“精神”经历。他当时31岁，也像艰苦的内战和长征中的幸存者那样，既年轻，又纯洁。他的目的是弄清事实，查明真相，公诸于众，抵消蒋介石方面年复一年制造的弥天大谎。我们也难以置信，竟然会有毛泽东、周恩来等那样卓越的中国人。

“纯洁”的含义是，一个人经过千锤百炼，具备了良好的品质，就像金属在烈火里锤炼一样。红军战士，都是用这种经过锤炼的、“纯洁的”材料铸成的。几乎所有的红军战士都很年轻，都富有献身精神。记得1937年第一次到延安时，我听到有人这样讲：“红军战士非同一般——他们纯洁极了，毫无杂念。只要看着他们，就使我有返老还童之感。”

让我们再回到“一二·九”运动吧。

从某个方面来讲，所有领导者都是“纯洁”的，都具有献身精神。他们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自觉自愿地冒着牺牲生命和前途的危险，反对他们父母的权谋，反对南京、北平的所谓“政府”的政策。

清华大学处于残暴的镇压之下，然而，还是同燕京大学一起参与了领导工作。黄华把清华的一些学生领到我们家，例如，17岁的姚依林，就是五六名秘密指导者之一。除了大卫·俞^①以外，其

^① 大卫·俞即俞启威，又名黄敬。冀鲁豫边区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首任天津市长。——译者注

余的人，我现在记不清了。大卫·俞后来叫黄敬，作为一个地下共产党员，他经受了艰苦生活的锤炼和疾病的折磨，于1958年前后去世。“一二·九”运动后不久，黄华把他带到我们家，那是一个见面的安全地点。1932年，大卫·俞是燕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他在狱中几乎被处决，之所以得救，是因为他出身名门望族——他叔叔俞大维（音译）是蒋介石的高级军方人士，把他从监狱里保释出来。酷刑使大卫（即大卫·俞）患了心脏病，也患了严重的胃病。可是他对我说：“不惜一切代价地从事工作，我的情况就好一些。我现在觉得好多了。”大卫是许多纯洁的革命者之一。在他面前，横着一条条可供抉择的道路。

大卫告诉我，他得到母亲的帮助和支持，尽管母亲每时每刻都为他的生命担忧，把他当作自己的心头肉。大卫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可以这样说，他从未撒过谎，他想要了解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当时，或许以后，他是北平共产党组织的书记，1935年8月，这个组织遭到破坏（1978年，有人这样告诉我）。大卫的母亲是曾国藩的后裔，大卫是燕京大学教授曾昭抡的外甥。他舅舅一听说学生运动，就觉得大卫似乎是学生运动的大“智囊”。大卫常常在大白天“躲”在我们家，我们曾经一连几个小时地谈论马克思主义。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这样的人——看透了南京政府的本质，对这个政府嗤之以鼻。他告诉我，无论在什么方面想做任何有意义的事都无济于事，也都办不到。他独自做出参加共产党的抉择——反对他们的敌人——所以，他具有某种纯洁的目的和品格。

我这样认为，1936年2月，刘少奇到达北方时，大卫是他的“二号”人物。那时，“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大都加入了共产党。对于这一点，我多年来不太清楚，直到1972年才听说。这其中包括陈翰伯、黄华、龚普生等人。著名的清华巾幗英雄陆瑾1978